



爱尔兰·萨莉·鲁尼著 钟娜译
《聊天记录》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重读《聊天记录》

□张怡微

暑假参加了一个播客读书季的活动，和“一车烂话”的三位女生聊萨莉·鲁尼的新作。“一车烂话”的主播们都有正职工作，热爱阅读，对小说也有很多尖锐的看法。我们的主题是萨莉·鲁尼的新作《美丽的世界，你在哪里》，为了对谈做准备，我又重新读了一遍作者的处女作《聊天记录》。这是她在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我的阅读感受，好像比它刚出版时要好一些。

萨莉·鲁尼和我们印象中的爱尔兰作家作品，如乔伊斯、托宾、特雷弗等并不太相同。爱尔兰作家及一直以来文学艺术作品中的“爱尔兰裔”形象，其实有它的“刻板印象”，且这种“刻板印象”贴有负面的特征，贴着“劳工”“饥荒”“移民”“酗酒”“暴力”等标签。萨莉·鲁尼也不属于爱尔兰通俗类型文学系统的作者，如《战前酒》的作者、美剧《火线重案组》的编剧、曾在哈佛大学教授写作的爱尔兰裔美国作家丹尼斯·勒翰。正如我们在播客节目中聊天时，主持人小心地发问了一句，“她是不是没有上过班？”我倒不认为“上班”对作家来说是一件要紧的事，虚构的天地如此辽阔，作家可以编织烧杀抢掠，当然也可以内向地沉思。

熟悉文学史、又关注当代文学的读者，很快就会发现，有的艺术家极幸运，还有一种极其倒霉。我所认为的“幸运”，是作家本人确实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不幸，工作量也不大，在世即可获得名利，这是极少数人才有的命运。另一种则经历确实坎坷，而且细讲起来，还真有一些“倒霉”。例如有一个作家叫钟理和（代表作《原乡人》，邓丽君的歌曲《原乡情浓》就是电影《原乡人》的插曲），命运就是很让人惋惜的遭际，清贫多病，漂泊艰苦，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大奖，文稿又被组委会遗失。终于有机会再发一个重要作品，儿子因为摔断了腿无法帮忙邮寄……最后发稿时，他已病重过世，可解燃眉之急的稿费也没有领到。更不用说，那些半辈子在牢里的作家们了。

萨莉·鲁尼显然是幸运的那一类。她有意无意地挣脱了爱尔兰文学传统的束缚，运用了应景的全球化社交语言，为年轻人构筑了小说叙事的乐园。年轻人的情感方式，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可歌可泣的激情已成历史文物，萨莉·鲁尼开辟了一个令文艺青年产生共情又自困其中的情感话语：“我觉得倒不是说不爱他了。”（明明痛苦的死但不愿承认，明明可以打破僵局但这样就意思了。）

《聊天记录》写了一个爱尔兰女大学生弗朗西丝的情感故事。她本有恋人，后来又结识了女作家梅丽莎和她的丈夫尼克。四人关系暧昧拧巴，年轻的弗朗西丝陷入了与尼克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斗争。弗朗西丝就和被规训得很好的女大学生一样，具有鲜明的特征，不够自信、爱好文艺，在参与社会丛林开始生存战斗之前，偏好先走情感的桥梁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她们有机会可以直接去参与复杂的社会分配活动，直接面对在社会参与过程中人性的复杂，但“弗朗西丝”们还是如符合社会文化期待的方式，先从情感经历中看到了脆弱的自己和看不清的他人，尚未登上社会化的舞台。

小说中不乏有多处年轻者才会有心理活动，如“三十三岁真是太老了”，其实尼克年纪并不大。他只是比弗朗西丝大了十岁。小说里写得最好的部分，当然是这个四人关系的镜像作用。萨莉·鲁尼以细腻、体贴的自剖，实际上淡化了婚外恋的不伦，这是自怜的利益，也是年轻女性的困境本身。她对结构也比较敏感，十分注意对称性。她也有关注社会议题，新作中不乏有大量的“意见”，对文坛也有讽刺的看法。

《聊天记录》《正常人》及《美丽的世界，你在哪里》形成了萨莉·鲁尼个人的抽象IP，成为了流行现象。她的立场所应该警惕的内容，恰恰成为了她的一部分，评论她、关注她、经由她的抽象IP来谈论生活，是这个资本时代文学偶像孵化的历程。是这件事本身的戏剧性和反讽性，让我在重读《聊天记录》时反而读出了更有意思的东西，例如作者形象的形成，读者形象的形成，及想象的共同体。小说腰封上在发问：“在危急关头，我们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决定，我们究竟要爱谁。”但我们不要忘记，丛林就在眼前，“爱不爱的”只是通往丛林入口处的一座桥。美丽的世界就在前面。



西班牙·恩里克·比拉·马塔斯著 施杰、李雪菲译
《便携式文学简史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如何加入项狄社？

□育邦

20世纪20年代，领时代之先的艺术家、哲学家和作家马塞尔·杜尚、瓦尔特·本雅明、乔治·安太尔、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、乔治亚·欧姬芙、曼·雷、保罗·克利……他们都是一个神秘社团——项狄社的成员。要加入项狄社，其成员必须“具有较高程度的疯癫”，还须满足两个条件：首先，其全部著作不得沉重，应轻易就能装进手提箱；其次，须是完美的光棍机器。

这是西班牙作家恩里克·比拉·马塔斯的小说《便携式文学简史》写到的“真人假事”。《便携式文学简史》的关键词：表面上是“便携”，其核心是“项狄”，该书以项狄社的成立为叙事核心。书中写到雅克·瑞因特从非洲归来，心灰意懒，一心想自杀。在巴黎，他成立了项狄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分支机构——自杀总代理处。马里昂巴先生成立了卡夫卡股份有限公司，他慷慨地资助了瓦尔特·本雅明设计了一台欢快的称书机：能够侦测任何沉重、累赘、连叠缩后都放进旅行箱的书籍。本雅明非同小可，他为项狄社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他“所想象的地图是灰色的，十分便携，他甚至设计了一套色彩符号，用以标记项狄友人的家、举行集会的咖啡馆和书店、一夜旅社、欧洲图书馆的地下之光、通往各大学派的路，以及日渐饱和的墓园。”

而“项狄社”的核心要义是“项狄”，它是一种气质，是精神性的存在。马塔斯曾对“项狄”（Shandy）作出了这样的注释：“项狄”一词在“项狄故乡”的方言中意为：强颜欢笑、反复无常、神经错乱。如果要申请加入项狄社，必须具备典型的项狄特征，即：创新精神，极端性观念，胸无大志，漂泊不倦，难以与双重自我共处（因为他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黑暗租客），关心黑人地位，致力于蛮横艺术。

马塔斯从诗人保罗·瓦莱里那里寻觅到写作的“项狄”属性：“无限，亲爱的，其实微不足道；/这是个写作的问题。宇宙/仅存在于纸上。”典型的项狄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与世界性文化人，“作为典型的世界性文化人，他不歧视特立独行，热衷无疆界的国际文化，渴望一个拥有广大视野与广阔源流的世界，持和平时代美好的理想主义。”我觉得，这正是作者马塔斯的夫子自道，马塔斯确定无疑也是项狄社的一员。他的《巴托比症候群》写了什么？巴托比，作家梅尔维尔笔下那位以“我宁愿不”来拒绝一切的诡异角色，竟跃出纸页化身成为一种病毒，弥漫在文学世界中，让众多作家无法下笔。

得上巴托比症的人都无药可治，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。世界文学中，著名患者包括梅尔维尔、王尔德、普鲁斯特、穆齐尔、卡夫卡、塞林格、佩索阿……他的《巴黎永无止境》貌似仿写了海明威《流动的盛宴》，他的《似是都柏林》，无疑是向詹姆斯·乔伊斯和《尤利西斯》致敬的作品。马塔斯的文学丛林广阔丰饶，葳蕤繁盛，而其源流则是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。

项狄作家们有着自己的叙事风格，从而让项狄之旅得以“苟延残喘”：“这是场无用的运动，因为他们没有目标，没有追求，就像中世纪的朝圣者，重要的是旅行，无论到达的是坎特伯雷、耶路撒冷还是孔波斯特拉，他们只想一边讲着故事一边走。”

马塔斯的项狄社从何而来？当然是从斯特恩的《项狄传》而来。可以把《项狄传》称之为前现代社会的后现代主义之作。这是一本诞生于18世纪的小说，首次出版于1759年，对于那个时代而言，它异乎寻常地充满挑战性意味和实验色彩。《项狄传》全名为《绅士特里斯坦·项狄的生平与见解》，但是，这部厚厚的小说既无主人公项狄翔实的生平故事，更没有他的深刻见解。读完全书，你一定会大叫，此书彻底文不对题，整个文本充斥着作者津津乐道的东扯西拉、天马行空的插科打诨。

《项狄传》不是按照传统的小说规则以故事的发生、发展乃至结束的在线性逻辑展开的，而是以项狄的意识流动、自由联想为叙事驱动。它开启了马塞尔·普鲁斯特、詹姆斯·乔伊斯和弗吉尼亚·伍尔夫等第一批现代主义小说大师的创作道路。《项狄传》的出现，它对于小说刚刚形成的主要规则的公然背叛，是小说“自我探索”的结果，是小说富有强大生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的明证。《便携式文学简史》在21世纪的出现，特别是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后才产生，是项狄秘密而强大繁衍能力的显影，是小说的最终胜利。

删人快语



德国·埃尔克·海登莱希著 丁娜、杜新华译
《背对世界》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当她们集体转过身去

□蒯乐昊

德国女作家埃尔克·海登莱希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不够响亮，但在德国，她是久负盛名的媒体人、评论家、作家及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。记者的职业经历，拓宽了她的书写半径，也赋予她一种更加克制、冷冽乃至凶狠的文风，她把细腻、爱和悲悯，隐藏在刀锋之后。这位生于1943年的女作家尤以中短篇见长，《背对世界》就是这样一本叫人倒抽一口凉气之后仍会忍不住叫好的短篇小说集。

《背对世界》的概念来自罗曼·加里的名言，“因为一对恋人的幸福总是背对世界的……”但这本小说不满足于描写相爱，恰恰相反，她想写的是爱里面尖锐复杂的部分，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部分，她写时间的藤蔓是如何爬进爱的缝隙，写败下阵来的人们依然怀着残存的勇气。

全书开篇《最美丽的岁月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，女主人公一生中唯一一次带母亲去旅行，那时她们都已不再年轻，母亲年届八十，总是在批判女儿，女儿四十五岁，婚姻疲惫不堪，那次旅行，她本是要前往意大利与情人幽会，但母亲却强行插了进来，坚持要同行。

并不愉快的自驾旅途当中，往事的伤疤被一点点点开了，母亲长期与父亲不睦，唯一的女儿沦为不幸婚姻的牺牲品。母亲曾经残暴地殴打过女儿，把她打得遍体鳞伤，不得不逃去寄宿学校。而女儿最大的罪过，不过是因为：“你太像你父亲了”。

母亲拒绝承认自己打过女儿，激怒之下，女儿手握方向盘，开启了一种自杀式的逼供，“妈妈，如果连一次，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，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，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。见鬼。”

救赎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展开的。母亲承认她不爱父亲，也根本不要这个孩子。一切都是错误，生命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接受错误。而父亲是另一个故事，揭开的可能是国家的伤疤。当时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男人上前线，妇女和儿童被留了下来，母亲和丈夫的姐妹合力抚养孩子，女人们被迫变得强悍和独立。在仗打完之后，战争的合法性烟消云散，男人带着残疾和心灵创伤回到家庭，发现家中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，妻子不要他们了，孩子也大了，错过了跟父亲建立亲密关系的窗口期，等待着他们的是审判：法庭的和道德的——他们为纳粹工作过，即使在妻女眼中，他们也是一身血债的刽子手。

这是整个德国在战后的重大命题，如何反思战争，反思一个时代是如何在关键路口误入歧途，在小说中被海登莱希以白描的形式，织入故事的隐线中，一种举重若轻的高明。小说浮面是写母女关系，写原生家庭如何影响人们之后的亲密关系，但她实际上写出了每个人都是历史受害者的悲怆感。女儿在中年之后陷入离经叛道的爱情，在经历过世俗婚姻和与男人的不断绯闻之后，她在45岁爱上了一名意大利女子，此次去米兰，她就是要与她相会。

到了米兰，三个女人会面了，女儿谎称情人是自己同事。奇特的是，母亲似乎一眼就发现了她和那名女子之间的默契，但她没有发作，这个长期在精神上碾压女儿的统治者，竟然一瞬间柔和了下来。

两年后，母亲中风去世了，在弥留之际，女儿带着她的“女同事”去探望她，母亲突然做出了一个令她感到吃惊的动作，她拉过“女同事”的手，放在女儿手上。似乎是一种托付，也是一种授权。她没有说破，但她洞悉了女儿的秘密，很欣慰女儿在人生下半场终于得到了幸福。

故事写到这里本来已经十分动人，巨大的反转还在后面。母亲死后，女儿独自整理她的遗物，发现了母亲留给她一个信封，被胶水和胶带反复封存得结实结实，女儿感到慌乱，她意识到，母亲一生中唯一的、真正的、最大的秘密即将向自己展开。

信封里是四张照片，1940-1945年的母亲在照片上美貌异常，那是战火纷飞的时代，却被母亲定义为一生中最好的岁月。照片上是她和她的恋人在一起，她们搂抱着，穿着男装，抽着烟，照片背景里有一辆婴儿车，孩子在婴儿车中酣睡。

那个人，正是她丈夫的妹妹，那个跟她一起抚养女儿的卡拉姑妈。

隐匿之光

微言大义